

西方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恶化的虚与实

文 / 刘中民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国家与以色列的传统盟友关系在总体上发生深刻变化。其突出表现是伴随以色列扩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不断加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除美国外的西方世界，尤其是欧洲国家，普遍从同情、支持以色列转向谴责和反对，相关反以举措也逐渐转向更具实质性的制裁、停止军售等方式。即便是坚定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其内部对以色列的负面看法总体上也不断上升，政治精英和社会民众围绕以色列发生严重政治撕裂。当前，西方世界与以色列的关系降至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的最低点，这一变化将产生何种影响？

集体性地缘政治调整？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在整体上呈现出从象征性恶化向实质性恶化转变的特点。

首先，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西方国家数量迅速增加，这是双方关系恶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目前，西班牙是与以色列关系恶化最严重的西方国家，其不仅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持续抨击以色列，还于2024年5月与挪威、爱尔兰

一起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进入今年下半年，西方国家骤然出现承认巴勒斯坦国“热潮”。7月2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法国将在9月召开的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该声明“一石激起千层浪”。此后英国、加拿大、葡萄牙、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十余西方国家纷纷宣布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并以不同程度表达推动落实“两国方案”的意愿。至此，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总数增至157个，美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尚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有阿拉伯媒体评价称“这是欧洲国家集体性的地缘政治调整”。尽管有些言过其实，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方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立场的集体性转向。

其次，西方多国开始就反对以色列采取追责、制裁、武器禁运等实质性行动。2024年6月，西班牙宣布加入南非行列，向联合国国际法院起诉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成为最早通过国际法手段追责以色列的西方国家之一。进入今年下半年，一些欧洲国家开始采取制裁以色列的措施。例如，7月，斯洛文尼亚率先宣布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

运；8月，德国暂停向以色列出口任何可能用于加沙冲突的军事装备；9月8日，西班牙宣布旨在“终止加沙种族灭绝”的一系列措施，其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与以色列交易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禁止以军运载燃料船只停靠西班牙港口等；9月17日，欧盟宣布制裁以色列的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部分中止《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议》中贸易相关事项，暂停对以色列总计约2000万欧元的直接支持。

最后，西方社会反对以色列的民意基础不断扩大。一方面，近两年西方社会抗议以色列行动的游行示威频发，每当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加剧加沙人道主义灾难，这些反以游行规模就更大。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民众对以色列的负面看法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例如，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3月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53%的美国成年人对以持负面看法，而2022年这一比例为42%；其最新民意调查又显示，美国50%左右共和党人对以持负面看法，且美国公众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支持率已降至约32%。又如，2023年11月，仅31%的德国人反对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但2024年6月，这



一比例扩大为61%。今年6月，一项覆盖英、法、德、意、西班牙和丹麦的民意调查显示，所有主要欧洲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率几乎都跌破了40%。可以说，以色列的道义形象和国家形象在西方民意中滑坡已成客观事实。而这种滑坡，通过影响各国政党和选举政治，不断影响着西方国家的巴以政策。

“道义制高点”与现实利益的叠加驱动

总体来看，双方关系恶化主要有两方面因素驱动。从道义方面看，以色列严重违反国际法准

则的行为，使其遭到几乎来自全世界的谴责和反对。迄今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已致超6.7万人死亡、超16万人受伤，无数儿童死于饥饿或严重营养不良，上百万民众流离失所，加沙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入人道灾难，冲击着人类良知的底线。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还频频袭击黎巴嫩、叙利亚、伊朗等国，并对目标人员采取暗杀、定点清除等手段，不仅严重侵犯相关国家主权，还造成大量伤亡，殃及民众。

从现实利益方面看，本轮巴以冲突及其外溢产生的消极影响，已严重威胁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与社会稳

定。由于地缘毗邻及长期以来在经贸、能源、移民等领域联系密切，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长期受中东局势动荡冲击。2011年所谓“阿拉伯之春”发生后，伴随中东局势动荡而生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难民危机、能源危机等问题，严重影响欧洲发展与安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之时恰逢欧洲因乌克兰危机陷入能源危机，而也门胡塞武装为策应哈马斯的反以斗争酿成的红海危机导致全球重要航运通道受阻，进一步冲击欧洲的能源供应和对外贸易。一旦以色列全面占领甚至“清空”加沙，200多万加沙民众将集体沦为难民，这必将严重冲

击欧洲，造成继2014年叙利亚难民危机后的又一次难民危机。因此，从自身利益出发，欧洲需在巴以问题上采取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相近立场。同时，欧洲穆斯林群体整体规模不可小觑，欧洲国家的巴以政策也直接关系到本国政治和社会稳定。受上述现实利益影响，叠加冷战后欧盟强调“人权”与“价值观”的“规范外交”，使欧洲与美国在巴以问题上分歧严重，这也是欧洲国家反对以色列的重要原因。

将产生多大实质影响

尽管当前西方世界与以色列关系的恶化“前所未有”，但受复杂历史与现实因素制约，其实质影响恐较有限。

首先，对巴以问题的影响有限。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西方国家激增，固然有利于加强巴勒斯坦建国的国际合法性，也在道义和外交上使以色列陷入严重孤立，但这难以改变以色列实施强硬政策导致巴勒斯坦在领土、人口、治理等方面陷入主权和治权危机的窘境。


目前，推进“两国方案”与巴勒斯坦建国困难重重。一是以色列坚决反对巴勒斯坦建国。在西方多国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后，以色列威胁吞并约旦河西岸作为对西方的回应，而这将使巴勒斯坦建国的基本领土条件更加难以实现。二是美国坚定支持以

色列并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全面支持以色列，并多次在联合国阻挠通过结束巴以冲突、推动落实“两国方案”的议案，同时极力压缩巴勒斯坦的国际空间，不但暂停或取消对巴援助，还禁止有关方面为巴勒斯坦官员参加联合国大会发放签证。三是重启巴以和谈困难重重。加沙停火、战后政治安排、 Hamas 未来命运、巴勒斯坦内部分裂问题、建立巴以谈判国际机制等事关巴以和谈的一系列问题复杂难解。

其次，难以动摇西方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的总体结构。一方面，欧洲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多为形势所迫，而其在美欧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动摇美国偏袒以色列的政策。欧洲多国主要从掌握“道义制高点”、维护自身利益、稳定国内政治等角度出发承认巴勒斯坦国，且多以 Hamas 释放全部人质、解除武装为条件，除少数国家对以色列发起制裁或武器禁运外，多数欧洲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并无实质倒退，双方政府层面合作不会受到太大影响。而从美欧盟友关系的本质而言，美国在跨大西洋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特朗普政府强势傲慢的对欧政策，尤其使后者难以在巴以问题上挑战美国。

另一方面，欧盟内部分歧严重，难以形成统一政策，这将削弱其国际话语权，而欧盟内部复杂的决策程序也使政策影响大

打折扣。其一，当前仍有多个欧洲国家尚未承认巴勒斯坦国，这表明欧洲内部存在着一个支持以色列的集团。德国、意大利、荷兰、丹麦、芬兰等国尚未承认巴勒斯坦国，特别是作为欧洲核心国家之一的德国，受二战时纳粹德国屠杀600万犹太人的历史影响，出于“历史责任”等原因，二战后的德国长期与以色列保持密切政经关系，其支持对以色列而言十分重要。其二，历史上东欧国家犹太人分布较广，且遭受纳粹德国迫害较为严重，因此这些国家对以色列的政策较其他欧洲国家更为谨慎。如匈牙利曾极力反对欧盟制裁以色列。其三，欧盟和欧洲各国政府决策程序普遍繁琐冗长、效率较低。欧盟很多政策常因成员国否决难以实施，而欧洲国家的政策也因需获本国立法机构批准存在被否决的可能。此外，西方社会对以色列的反对往往被以色列及其西方支持者视作“反犹太主义”，甚至上升到政治正确的高度，这极大限制西方多国政府改变对以色列政策立场的空间。

总之，近一段时期，西方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在整体上确实降至“史上最低点”。然而，由于犹太人在西方世界的特殊历史过往，“反犹太主义”高度敏感，在美国与以色列关系仍根基牢固的情况下，尽管双方关系持续恶化，但仍未达到彻底破裂的境地。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